

# 微信时代的精神家园 (二)

本报特约撰稿人：郑国和

随着手机和微信的普及，很多人整天泡在网上浏览转来转去的帖子或视屏，不仅把过去用来读书思考的时间占尽，还可能损害健康。这一现象已经引起各界重视，比如苹果产品现在都有当日上网时间（Screen Time）记录显示，提醒用户自我控制上网时间。也有人感叹：“大家整天看帖子，来自别人的想法”，“我们整日忙忙碌碌，却又无比空虚。”

对这一现象我也一直忧心忡忡。然而，有一个微信群却不在我的忧虑之列，那就是我前年加入的“印州77-78级同学40年回顾群”。去年我写过一篇稿子，讲述这个群在过去的两年里不仅没有引起我的忧虑，而且成为我在微信时代的精神家园。今天，我想用新近的例子再次介绍该群的三大特点——成员创作多、高质转发多、深入讨论多。正是有了这三大特点，“回顾群”才成为我在微信时代的精神家园。希望我的介绍能给读者提供一个参考，让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找到自己微信时代的精神家园。

（编者注：《微信时代的精神家园<一>》刊登于本报2019年10月18日专题版（第A12-13版），可在本报网站www.yamei-today.com往期回顾查看。）

## 成员创作多

我登录了二十几个微信群，“回顾群”是唯一常有群友分享自己创作的群。上次稿子寄出后，我在群里又陆续读到不少群友的创作，董丰的长文《我们曾经年轻》就是其中之一。为纪念知青上山下乡五十周年，中国青年作家学会、香港中华青年作家学会等五单位于2018年举办了征文活动，董丰的投稿荣获征文一等奖，被收录在四卷本的优秀应征作品集《永远的知青》里。

《我们曾经年轻》从作者1968年7月去内蒙古锡林格勒盟牧区插队讲起。两年后，她患肝炎回北京治疗，病愈后身体虚弱不能适应内蒙的严寒于1970年秋转插到她姐姐下放的山西省山阴县罗庄。因需就近照顾身受迫害又患重病的母亲，她于1971年12月告别罗庄，转插到陕西省长安县杜曲公社。就在二次转插手续受阻时，一个偶然使她在同月被西安建材厂招工，结束了她三年半的知青生活。后来她从西安考取大学，毕业后分配回北京工作。

董丰的长文印证了不少我自己知青时代对中国农村的观察。比如关于当时内蒙和山西农村的落后面貌她写道：“内蒙牧区生活环境比较原始。蒙古包后面就是天然厕所，浩特（畜群组住地）里的狗很快会把粪便清理得干干净净……当时雁北的农业生产方式非常落后，农活基本靠人力。谷物脱粒靠人扑打，用的是战国时期就有的农具连枷。庄稼地的平地用人拉石头碾子完成……单身汉一个人的分的口粮不够吃……或者半年劳动，半年到内蒙流浪讨饭。”我下放的湖北省红安县的卫生条件也很原始，比如至少男的出工在田野大便要么用石头要么用树叶擦屁股。红安农民和山西农民一样，也是食不果腹，不过那里的生产工具似乎比山西稍好。比如我们那里平田平地都用牛，谷物脱粒也用牛。先把田里收割

的一捆一捆的草头（带茎稻子）在打谷场上铺开晒干，再用牛拉石碾不停地碾压脱粒，然后用两个长齿的大木叉将稻草和脱落的谷粒分开，再然后扬场，就是用木锨将扫成一堆的谷子抛向空中，利用风力将谷粒和仍然夹杂的细碎稻草分离。——然而，畜力不也是战国时期就有的生产方式吗？

长文里“日访庞家堡”一节给我的印象特别深。那天傍晚她沿着水渠回罗庄时，看到一个鬼魅一样的身影悄然飘过，吓得她情急中“跳到水里游到对岸逃生”。后来得知，那是一个精神病男，出行经常一丝不挂。“在农村，这样的精神病人得不到治疗，只有自生自灭。”这令我想起我下放的华家弯村口总有一个成年智障半躺在那里。他目光呆滞，破衣烂衫，随着躺姿的变换，生殖器时常完全外露，村民们则若无其事地从他身旁走过，人类的文明和残疾人的尊严荡然无存。可见董丰的观察与我的基本一致，说明残疾人自生自灭的现象在当时的中国农村并非罕见。

文章还提到她知青期间坐火车回城探亲时曾经逃票，而我在知青期间曾和同学偷过生产队的大白菜。可贵的是她从这些往事里看到与今日中国的联系：“社会把知青抛给农村，抛进赤贫，知青回报的是对社会规则的不恭和反叛……如今众人笑谈中国大爷大妈的种种令人侧目的小伎俩，都产生于在那个贫穷时代中的历练。”这点是不曾想过却不得不承认有些道理的。

我在群里读到的另一篇创作是李志雄长达66页的文章《乱世学子》，文章曾以笔名凌志发表在2014年《白桦文选》第九期上。在去年的稿子里我介绍过李志雄分享的他的文章《寻找二舅的足迹》。文章以周密的调查还原了他二舅抗战中于1942年3月31日作为国军飞行员殉国的历史，促使大陆政府决定将周应熊的英名补刻到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上，使烈士为国捐躯的荣誉得到祖国和人民的承认。《乱世学子》讲述的则是他大舅周应霖的故事。文章依据的资料是他偶然得到的他大舅遗留的一本影集和大舅生前在台湾国立清华大学校友会会上发表的文章选段。

《乱世学子》分五个部分，按照选段记述的时间顺序展开。周应霖生于广东省南海县西樵乡一个大户人家。作为大少爷的他生性贪玩，尤爱摄影。那时中国有照相机的私人凤毛麟角，霖却是机不离身，无意中为乱世中的中国学子留下了极为珍贵的记录。霖摄于1950年以前的相册大都毁于当年的土改狂潮，保存下来的只是他带到台湾的，其中就有作者得手的那本。霖于1935年从广州报考北京的四所大学，燕京等三校都录取了，唯独清华榜上无名。在燕京政治系读了一年，他再次报考清华，这次以首名上榜。霖为什么执意要从燕京转学清华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文章将私立的燕京和国立的清华这两所不相上下的一流大学从建校史、办学宗旨、师资力量、图书资源、校舍乃至学费等一一对比得出结论：他不过是想证明自己。这一点其实也被霖自己关于燕京一年的美好回忆所证实：“在燕京一年……无论在生活上或读书上，对于一个刚读完中学踏进大学之



▲ 陆瑾演讲照（摘自维基百科）

门的考生，都是一种令人喜悦与兴奋的经验。”《乱世学子》在这里插入多幅霖摄的燕京校园和学生生活的照片，作为他喜悦与兴奋经验的见证。

选段接着说：“在大学第一年中，华北政局非常不安定。学生发动了多次大游行，我参加了第一次“一二·九”和第二次“一二·一六”游行。”《乱世学子》在这里又插入多幅霖用相机记录的一二·九运动照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整理一二·九运动照片时，“赫然发现”一张极著名的照片竟出自自己大舅之手！这就是后来成为一二·九运动象征的清华大学女生陆瑾（1914-2015）演讲照，而后来新华社、清华大学、共青团中央等各网站上登出的全是该照质量粗糙的盗版翻拍。

关于霖在清华的经历，选段说“民廿五、廿六年华北情势紧急，我尚能在北平清华园读书享受一年，真是福气。政治系十一级同学不到十人，教授较学生为多，”且个个都是大名鼎鼎，学贯中西，学生每天都有“读不完的书，享不尽的乐趣”。然而，清华园的安宁，不过是全面抗战前的安宁。霖在清华的大二一结束，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陷落，学子们暑假后无学可回。国难当头之际，教育部为保存战后重建所需的人才，决定由国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共同在大后方组建国立临时大学，即西南联大。霖在西南联大完成了大学学业。霖说自己大学四年的成绩中，以战乱中在西南联大的大三四大为最佳——有他各年成绩单的原件为证——这不得不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迹（这一奇迹最为著名的例子当然是该校还培养了诺奖得主李政道和杨振宁）。毕业后的霖随即走上了抗日的战场。

（下接第B3版 →）